



高教资讯

2018年第4期(总第27期)

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中心 编

2018年5月10日

本期要目

- 15 句话感受习近平在北大对青年和教育的殷切希望
- 高校人才分类评价改革如何落地
- 教育学科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探究——以 22 位长江学者为例
- 新型高校能否激活一池春水
- 看得懂做不到的“剑桥之经”

目 录

高教要闻

15 句话感受习近平在北大对青年和教育的殷切希望.....	1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引导高校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3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4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将设学分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	5
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7
教育部上海市召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2018 年度工作推进会.....	9
高校人才分类评价改革如何落地.....	10

理论经纬

教育学科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探究——以 22 位长江学者为例.....	14
------------------------------------	----

本期视点

新型高校能否激活一池春水.....	21
邬大光：看得懂做不到的“剑桥之经”.....	26

大学课程

大学课堂该如何消灭“水课”.....	28
慕课助中国高等教育“变轨超车”.....	32

15 句话感受习近平在北大对青年和教育的殷切希望

5月2日，在“五四”青年节和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校庆日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考察，与北大师生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广大青年要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为您摘编了讲话中的15个“金句”，一起感受总书记对教育、对青年的殷切希望和谆谆教导。

1. 青春理想，青春活力，青春奋斗，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

五四运动源于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始终激励着北大师生同人民一起开拓、同祖国一起奋进。青春理想，青春活力，青春奋斗，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

2. 广大青年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

广大青年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我说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广大青年要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3. 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

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广大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4. 我们的明天需要青年人接着奋斗下去

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一

项长期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我们的今天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的明天需要青年人接着奋斗下去，一代接着一代不断前进。

5.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

6.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学。”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共同使命。大学对青年成长成才发挥着重要作用。

7.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今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在世界人民心目中马克思至今依然是最伟大的思想家。

8.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

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

9. 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

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教师队伍素质决定着大学办学能力和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一大批各方面各领域的优秀人才。

10. 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立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来建设，可以借鉴国外有益做法，但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11. 当代青年是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

当代青年是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我们面临的新时代，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关键时代。广大青年既拥有广阔发展空间，也承载着伟大时代使命。

12. 要爱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要爱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13. 要励志，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广大青年要培养奋斗精神，做到理想坚定，信念执着，不怕困难，勇于开拓，顽强拼搏，永不气馁。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14. 要求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

知识是每个人成才的基石，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学习就必须求真学问，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不能满足于碎片化的信息、快餐化的知识。

15. 要力行，知行合一，做实干家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正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引导高校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教育部日前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的通知，《计划》要求，引导高校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成果的重大突破，进一步提升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支持高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设置人工智能学科方向。

《计划》指出，到2020年，基本完成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优化布局。到2025年，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人

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取得一批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原创成果。到 2030 年，高校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中国青年报》2018 年 4 月 11 日 作者：叶雨婷）

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呈现时代特点、中国气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4 月 9 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宝生主持召开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领导小组 2018 年工作要点和领导小组会议议事规则，对 2018 年工作做出安排部署。

陈宝生在讲话中指出，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亟待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贡献、思想引领和实践创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吹响了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科学的集结号、冲锋号。如何写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宏伟篇章，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教育战线的重大政治任务 and 艰巨历史使命。

陈宝生强调，2018 年教育战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鲜明主题主线，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做出味道、形成气候，做到“六个好”。**一是举好旗。**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把教育战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大格局，强化“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立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丰富实践经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研究宣传阐释上做出贡献。**二是开好局。**行动的秘密在于理论优先，理论的秘密在于实践第一。要找准新时代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突破口、聚焦点、主旋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思想贡献和理论支撑。

三是破好题。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系统回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时代课题，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转化为推动教育战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实际行动。

四是答好卷。努力解答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全局性、方向性和根本性问题，采取适宜的研究方法，遵循适宜的理论范式，把理论、方法、政策措施有机结合起来，拿出高质量研究成果。

五是定好位。明确教育战线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在党的理论工作队伍中的定位，明确教育战线哲学社会科学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定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教材体系、评价体系，服务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服务于教育事业改革发展。

六是育好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高端人才创造良好条件和生态，促进优秀人才不断成长。

（教育部网站 2018 年 4 月 10 日）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将设学分

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

教育部近日印发《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明确课前、课中、课后全流程管理，规范学分设置、教务安排、教研管理、教学方法、考核评价等各项教学工作，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价值引领功能。

《基本要求》要求严格落实学分，明确各学段课程学分，并从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学分中划出 2 个学分、从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学分中划出 1 个学分，开展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学生既可通过参加教师统一组织的实践教学获得相应学分，也可通过提交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相关的实践成果申请获得相应学分。网

络教学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辅助手段，不得挤占课堂教学时数。

《基本要求》提出要规范建设教研室（组），由教研室（组）具体负责课程的教学管理工作，统一实行集体备课，要丰富集体备课载体，通过多种方式有针对性地增强集体备课效果。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按课程分别设置教研室（组），研究生的可结合实际设置教研室（组）。要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350的比例设置专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岗位，为每个教研室（组）配足师资。思想政治理论课兼职教师、特聘教授，要由相应的教研室（组）规范管理。

《基本要求》强调严肃课堂教学纪律，鼓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结合教学实际、针对学生思想和认知特点，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要拓展实践教学形式，注重实践教学效果，将网络教学作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推动传统教学方式与现代信息技术有机融合。

在强化科研支撑教学和评价教学质量方面，《基本要求》明确要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科研评价机制，将科研成果在教学中的转化情况作为重要考核指标，要建立健全多元评价机制，并合理运用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在教师职务职称评聘标准中提高教学和教学研究占比，评价结果与绩效考核和津贴分配等挂钩，基于评价结果探索建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课堂教学退出机制。

对考核方式，《基本要求》指出要采取多种方式综合考核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实际运用，注重考查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力求全面、客观反映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思想道德品质。

《基本要求》强调要落实高校主体责任，建立健全教学管理制度体系，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强化地方统筹管理，原则上各地都要分课程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要加强全国宏观指导，适时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情况督查，推动各方面把教学管理责任落到实处。

（《中国教育报》2018年4月25日 作者：万玉凤）

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

近日，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通知，提出要到 2022 年基本实现“三全两高一大”的发展目标。

其中，“三全”指教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学习应用覆盖全体适龄学生、数字校园建设覆盖全体学校；“两高”指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师生信息素养普遍提高；一大指建成“互联网+教育”大平台。教育信息化从 1.0 时代进入 2.0 时代。

从建设应用到融合创新

事实上，早在 2017 年 12 月，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就表示，教育部将实施“教育信息化 2.0”行动，并引发广泛讨论猜测。

教育信息化 2.0 与 1.0 有何区别？杜占元认为，如果说教育信息化 1.0 是引入外部变量的话，那么，2.0 就是要把这些外生变量转化成内生变量。

具体来说，教育信息化 2.0 要实现从专用资源向大资源转变；从提升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向提升信息技术素养转变；从应用融合发展向创新融合发展转变。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杨宗凯曾指出：《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对我国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提出两个阶段的构想：

2012-2015 年，初步解决教育信息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基本形成与国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教育信息化体系。

2016-2020 年，根据行动计划建设进展、教育改革发展实际需求和教育信息化自身发展状况，确定新的建设重点与阶段目标。

他认为，经过前期发展，我国教育信息化已经基本度过第一阶段，信息技术在我国各级各类教育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尚未引发教育的深层变革。

“教育信息化 1.0 向 2.0 时代转变，即从重点关注量变向重点关注质变转变；从强调应用驱动、融合发展，向注重创新引领、生态变革转变。”

教育信息化 2.0 将给我们带来什么？

上海市电化教育馆馆长张治表示，教育信息化 2.0 将带来以下转变：

教育资源观转变。“过去，我们将知识资源数字化、平面资源立体化，但这还不够，我们要更强调基于互联网的大资源观。这个大资源观既包括知识，也包括知识之间关系，即知识图谱；既包括填充学生头脑的，也包括点燃学生智慧的，教育不是把一杯水注满，更多是把一团火点燃。”

技术素养观转变。从技术应用能力转向信息素养能力，“我们不仅要利用技术，更要利用信息素养和信息技术合作。”

教育技术观转变。教育技术不能仅停留在学习环境，而要嵌入学习系统中去。

发展动力观转变。“过去，我们非常强调教育系统的应用，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尚未得到充分体现。”

教育治理水平转变。过去的教育治理是补救型的，先出现问题、后治理问题，没有强调教育治理现代化。

思维类型观转变。“当今教育面临的问题之一是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工业时代，我们的思维类型急需从工具型思维转向人工智能思维。”

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如何实现？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主要提到三点：

“三通”提效增质、两平台融合发展。三通包括“宽带网络校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两平台包括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教育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教育信息化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演进，全面提升师生信息素养。将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全过程，推动改进教学、优化管理、提升绩效；推动师生从技术应用向能力素质拓展，使之具备良好的信息思维，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应用信息技术解决教学、学习、生活中问题的能力成为必备的基本素质。

构建一体化的“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引入“平台+教育”服务模式，整合各级各类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支持系统，逐步实现资源平台、管理平台的互通、衔接与开放，建成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融合众筹众创，实现数字资源、优秀师资、教育数据、信息红利的有效共享助力教育

服务供给模式升级和教育治理水平提升。

(新浪教育 2018 年 4 月 24 日)

教育部上海市召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2018 年度工作推进会

4 月 22 日，教育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在沪召开深化上海教育综合改革 2018 年度工作推进会，回顾总结 2017 年进展情况，研究部署 2018 年各项工作。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宝生指出，这是党的十九大后教育部和上海市召开的首次推进会，更是部市共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一次推进会。希望继续完善部市会商的诊断机制、试点机制、创新机制、示范机制和务实机制，科学研判教育综合改革的深层次问题，高质量推进改革的“内部装修”，聚焦目标、重点突破，提供改革样板，放大改革效益。

陈宝生充分肯定了上海市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进程中率先启动、率先探索、率先受益、率先带动，为全国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贡献了智慧、积累了经验。他强调，进入新时代，中央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民群众对教育充满着新的期待，全球教育发展孕育着新的变局，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教育发展面临着新情况新问题。希望上海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中立足自身、着眼全国、放眼全球，加快步伐、攻坚克难。一是继续在完善党对教育工作领导的体制机制，加强教育系统党的建设，做好学校思想政治和意识形态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上先行先试。二是继续在完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补齐教育事业发展短板，全面提升教育品质，增强教育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上加快推进。三是继续在提高现代教育治理能力，激发社会力量兴办教育，推进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增强教育发展内在动力上改革创新。四是继续在完善现代

教育保障体系，营造更加良好的教育改革发展环境，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上不懈探索。

（教育部网站 2018 年 4 月 22 日）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更重视教书育人、代表性成果评价—— 高校人才分类评价改革如何落地

“我以前曾经预测，中国会在 2020 年每年发表论文数超过美国，没想到我们提前完成了。”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坦言，中国现在垃圾论文太多，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的情况普遍存在，其背后是高校及科研人才评价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

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把教书育人作为人才评价核心内容、实施代表性成果评价、评价方式多元化、科学设置人才评价周期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进一步明确了人才评价的方向。为改革叫好的同时，人们也在关心，这条机制改革之路该如何走到底？

把教书育人作为核心评价内容

重科研轻教学，是不少高校多年来一直存在的现象，兢兢业业教学付出得不到认可，是许多高校教师心中的痛。

《意见》提出，把教书育人作为教育人才评价的核心内容，要求所有教师都必须承担教育教学工作，建立健全教学工作量评价标准，落实教授为本专科生授课制度。

“突出教育业绩评价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导向，教授授课应该是基本要求。”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副教授万怀宇说，在他看来，注重高校教师的授

课是对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本职的回归。

“高校有正高级职称的学者大多有丰富的研究经验，让他们多走进课堂，对学生来说大有益处。”北京科技大学人事处副处长袁文霞说。

而对教书育人情况又该如何评价？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李奇教授分析说，不同高校、不同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数量和比例都影响着对教师教学的评价。“比如，研究型大学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往往是分不开的。而评价非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时，教学可能会占到更大比重。即便在同一所学校，不同教师所承担的科研和教学任务量也不一致，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更截然不同，因此，评价标准有必要进一步精细化。”李奇说。

为了对教师进行更精细的评价，近年来，不少高校尝试将教师岗位分类。从2010年起，浙江大学将教师分为教学科研并重岗、教学为主岗、研究为主岗等类别。2014年底，湖北省首次在省内高校推行职称分类评审。北京科技大学则在教学为主型岗位的基础上，自2016年起增设高级讲师职务，面向长期在教育教学一线工作的教师，更加突出对教学方面标志性成果的评价，而对于岗位要求教学科研并重的教师，也要求其授课学时数需达到所在学科平均水平。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宁本涛看来，对于高校教师的教学评价不仅要关注量，更要注重质。“教师要真正设计好每一堂课。”宁本涛说，“要不断调整教案，注重讲课的艺术性、趣味性，而不是一味追求数量。此外，与学生探讨问题、关心学生成长也是在育人。要设定好激励举措，吸引老师做好这项本职工作。”

此外，还有专家提出，教书育人的质量到底该由谁来评价、学生纳入评价主体是否公允、该设置哪些评价指标、评价过程中又该怎么判定，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细化。

实施代表性成果评价

重视教书育人，旨在扭转教师在科研和教学上精力投入的失衡，以及评价指标的单一化。而科研评价本身，一直以来也存在着评价过于重量化、指标化、功利化等不合理现象。施一公所言的“垃圾论文”过多、论文泛滥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就是由此造

成的。但如果没有论文，科研的质量又该如何反映？

此次出台的《意见》，明确要实行代表性成果评价，突出评价研究成果质量、原创价值和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贡献。改变片面将论文、专利、项目、经费数量等与科技人才评价直接挂钩的做法，建立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

“‘一招鲜’的代表性成果评价可谓抓住了科研评价的‘牛鼻子’。”宁本涛说，在他看来，此举能有效把握科研评价成果量和质的平衡。

什么可以纳入代表性成果的范畴？去年9月，浙江大学发文提出，在校师生在媒体及其“两微一端”发表的原创作品，根据其传播效果和影响力，可被认定等同于国内核心学术期刊论文，并纳入晋升评聘和评奖评优，这项政策一度引发热议。宁本涛认为，这样的尝试同样可以作为代表作新的“打开方式”。

事实上，早在2006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就提到，探索建立代表作评价制度。而分别在2016年和2017年发布的《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中，都明确提出了建立“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鼓励潜心研究、长期积累，遏制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近年来，各大高校也有所行动。如复旦大学从2015年起规定，在满足科研和教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有代表性教学成果的教师可以优先晋升职称。经过几年摸索，北京科技大学将代表性成果的评定范围扩展到学术论文、著作教材、发明专利、标准制定、决策咨询等方面。

与评价教书育人一样，代表性成果评价同样面临的问题是，谁来评、怎么评？“世界一流的院校一般都是请国际同行来进行评价。存在交集的可能越小，公正性也就可能相对越高。”李奇说。

但是，国内论文海外送评也存在着评价标准有差异等“水土不服”的问题。而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同行评议如何尽可能减少主观判断，克服人情等因素的影响，也需要考量。

评价标准落地需变革人才管理体制

指标和评价方式的多元化，让人才评价有了更合理的依据。但要使之真正落地，需要人才管理体制的变革。

此次出台的《意见》，提出要保障和落实用人单位自主权，合理界定和下放人才评价权限，推动具备条件的高校、科研院所自主开展评价聘用（任）工作。

但事实上，一些高校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现象仍是人才评价过程中面临的障碍。“按照行政管理的思路不太适合学术评价。”李奇说。

宁本涛发现，一些高校虽有了评价自主权，但评价程序、环节依旧繁复，“对被评价者来说还是接受考核的状态”。而这当中还会存在虽然程序公平但评价受一些外行及行政力量干预的现象。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分析说，正是由于管理的泛化导致了评价主体专业性的弱化。他解释说，当下国内高校在论文、职称评定的过程中，大多要依靠学术委员会，而在很多高校，学术委员会仍采取行政组织的架构，人员组成也相对固定，这也就难免会出现外行评价内行的情况。他举例说，教育原理和教育技术两个专业虽隶属于同一学院，但二者实质上完全不相通，如果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不能两个方向兼顾，势必难言公平。

“从精细化管理的角度来看，人才评价的重心还应该下放到院系，这也是当前国际流行的趋势。”李奇说。

归根结底，人才分类评价是为了激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其更好投入教学科研等工作，实现职业发展和人生价值。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执行所长顾琴轩认为，一所高校想要将人才分类评价改革进行到底，首先校领导和职能部门要结合自身定位，制定和优化符合其学校气质的人才分类评价政策，更新管理理念。同时，从顶层设计上，对于“长江学者”“杰青”等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人才称号，其评价体系也要变革，从而使高校的人才评价过程中减少外部功利性因素的影响。

（《中国教育报》2018年4月9日 作者：杜玮）

教育学科高层次人才成长规律探究

——以 22 位长江学者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略)

二、研究对象与基本情况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教育学科的 22 位长江学者为研究对象。(见表 1)

表 1 教育学科 22 位长江学者基本情况

入选年份	类型	姓名	入选年份	类型	姓名
2005 年	讲座教授	曾满超	2015 年	特聘教授	阎光才
2007 年	特聘教授	石中英			程天君
2009 年	讲座教授	莫家豪			孙杰远
2011 年	特聘教授	张斌贤		青年学者	周海涛
		刘海峰			秦玉友
2012 年	特聘教授	邬志辉			黄兆信
	讲座教授	张华华	黄荣怀		
2013—2014 年	特聘教授	李政涛	2016 年	特聘教授	徐小洲
		张应强			朱德全
2015 年	特聘教授	刘宝存			青年学者

(二) 基本情况

1. 性别。我国教育学科 22 位长江学者全部为男性。乔纳森·R·科尔 (Jonathan R. Cole) 认为, 科学体制是一个高度分层的体制, 男性科学家比女性科学家更容易获得升迁, 在科学声望方面更加出名。2007 年科技人力资源调查表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女性仅占 5.0%,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中女性仅占 4.6%, 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中女性仅占 8.4%。即使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2011 年在入选中国校友会网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名单中女性仅占 6.9%。

2. 入选长江学者时的年龄。2007 至 2009 年间长江学者评选条件规定人文社会科学类特聘教授不超过 50 岁, 讲座教授不超过 60 岁; 2011 至 2014 年间特聘教授调整至

不超过 55 岁,对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的优秀人才放宽两岁;2015 年增加青年学者项目,要求不超过 45 岁。我国教育学科 4 位青年学者入选长江学者时年龄最小为 35 岁,最大为 44 岁,平均年龄为 41 岁;15 位特聘教授入选长江学者时年龄最小为 40 岁,最大为 56 岁,平均年龄为 49 岁;3 位讲座教授入选长江学者时年龄最小为 45 岁,最大为 59 岁,平均年龄为 51 岁。

3. 成长周期。将获得博士学位到入选长江学者之间的时间定义为长江学者的成长周期。我国教育学科 22 位长江学者的平均成长周期为 12.9 年,周期最短为 1 年,最长为 23 年。高勇研究发现,理科和工科长江学者从博士毕业到入选的平均周期为 11.3 年。比较发现,教育学科长江学者的成长周期长于理工科。

4. 地区流动。将教育学科 22 位长江学者的出生地、大学所在地和博士培养单位所在地按照直辖市、省会城市、普通城市、其他城市进行划分。其中,出生地为直辖市的仅有 1 位(占 4.5%),省会城市有 2 位,普通城市有 17 位,其他城市有 2 位。大学所在地为直辖市的仅有 3 位(占 13.6%),省会城市有 7 位,普通城市有 10 位,其他城市有 2 位。博士培养单位所在地为直辖市的有 11 位(占 50.0%),省会城市有 5 位,普通城市有 3 位,其他城市有 3 位。可见,他们向经济发展较快的直辖市流动明显。博士培养单位所在地为北京市和上海市的学者有 9 位(占 40.9%),可见,其地域分布较为集中。

三、内部条件

(一) 关注社会重大问题

期刊论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关键词是论文内容的高度凝练,通过关键词分析能够完整映射出研究者的关注点。截至 2018 年 1 月 9 日,将 22 位长江学者已发表的学术期刊论文数据(中文核心期刊和 CSSCI 来源期刊)导入 Citespace 软件进行关键词可视化分析。(见图 1)图中圆圈大小代表关键词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字体大小代表关键词的中心性,各圆圈之间的连线粗细代表关键词之间的联系程度。可以看出,形成了以“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农村教育”“义务教育”“创业教育”“教育改革”“人才培养”为中心的几大研究领域。另外,“城乡统筹”“科举”“高

考改革”“双一流”“区域经济”“美国”“信息技术”等中心性相对较弱，但依然形成聚合的研究领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第二部分的发展任务由“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八章组成，并在第三部分体制改革中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放在了前三章。可以发现多数学者将关注点聚焦于我国当前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重点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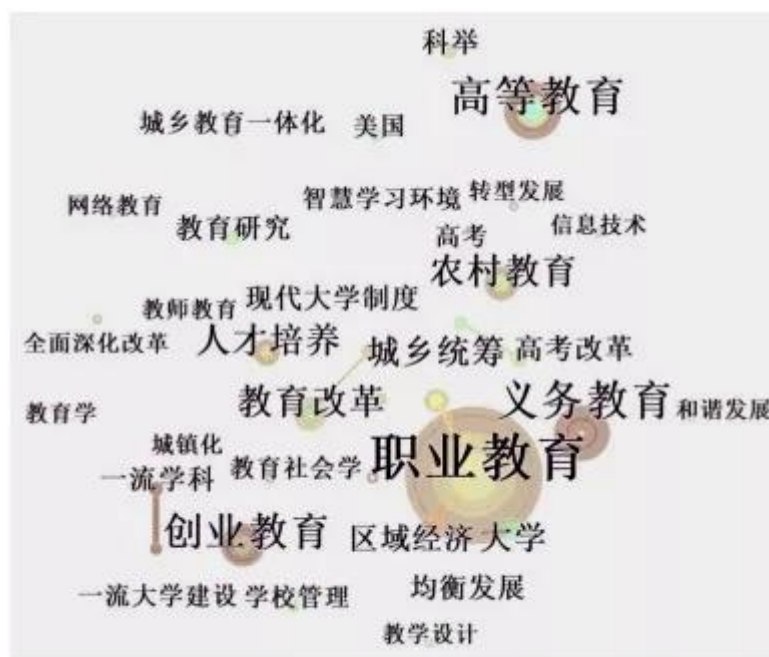


图 1 关键词分布图

具体来看，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将社会学研究工作总结为三个方向，即倾向于历史研究、倾向于关于“人与社会本质”的系统性理论研究、倾向于对当代社会事实和问题的经验研究。借助该分类方法发现，教育学科 22 位长江学者中有 3 位学者倾向于关注历史，从历史研究中透视未来先知性的观点；有 3 位学者倾向于关注基础理论，基础理论研究中洞察实践需求；有 2 位学者倾向于关注教育信息化，有 14 位学者倾向于关注当代教育政策与管理。

（二）保持专注科研精神

第一篇高质量论文是学者成长的重要一步，代表其初步具备了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将教育学科 22 位长江学者作为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发表的第一篇 CSSCI 或 SSCI 进行整理发现，有 18 位长江学者在博士毕业前已发表第一篇 CSSCI 或 SSCI 期刊

论文，占比 81.82%。可以看出，多数长江学者较早具备了独立完成学术论文写作的能力。另外，从第一篇高质量论文的研究内容来看，除 4 位长江学者第一篇高质量论文与目前研究方向相关程度相对较弱外，其余 18 位长江学者第一篇高质量论文均与目前研究方向一致。由于长期专注于某一研究方向，与后期的知识积累、实践经验、名师指导和某种信息的启发等共同作用后，产生了巨大的创造才能。乔纳森·R·科尔指出：“科学工作带来奖励，奖励又对获得未来的奖励产生影响。”说明那些早期在科学研究方面表现出色的学者能够分配到更多的资源，在优势积累上更容易获得成功。

（三）在实践中学习与反思

教育学科 22 位长江学者中，有 13 位学者在工作期间发表了第一篇高质量论文，占比 59.09%。其中，工作期间为本科学历的有 4 位，硕士学历有 5 位，博士学历有 4 位。另外，从教育学科 22 位长江学者的教育经历来看，仅有 3 位学者不间断完成大学、硕士、博士整个学业，其余 19 位学者均在大学到硕士或硕士到博士之间有暂时中断学业参加工作的经历，占比 86.36%。从具体的工作单位和性质来看，有 3 位学者大学毕业后在中学任教，11 位学者和 3 位学者分别在硕士和本科毕业后任职高校，担任教学或管理职务。

高勇对 1999 至 2009 年间 1051 位长江学者的研究发现，获得博士学位前有工作经历的学者占 51.2%，并发现长江学者中理学专业博士有工作经历的比例占 44.2%，农学、工学和医学专业博士有工作经历的比例均达 50% 左右，而在文科专业博士有工作经历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学科，达到 67.8%。B·拉图尔（Bruno Latour）等提出，不仅要研究独立于主体客观世界的表象，作为一种介入性的实践活动，还要把科学研究放入正在发生的实践过程中。教育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关注教育现象、解决教育实践问题是教育学者的责任和使命，通过发现实践逻辑而以归纳积累的方式实现教育理论向纵深发展是教育研究的基本方式。

四、外部环境

（一）大学阶段交叉学科背景

从教育学科 22 位长江学者大学阶段所学学科来看，教育学学科仅有 6 位，而理学

和工学学科有 10 位，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有 6 位，大学阶段非教育学学科占比达 72.73%。硕士和博士阶段所学学科均为教育学科的学者有 17 位，另有 4 位学者在硕士和博士阶段分别主修统计学专业、经济学专业、历史学专业和社会学专业，还有 1 位学者硕士阶段为数学系概论统计专业，博士阶段为电子系教育技术专业，硕士和博士阶段非教育学学科占比 22.73%。宗农和瞿振元研究发现，两院院士多数拥有多元复合的教育经历。吴坚研究发现，国外知名大学校长普遍拥有多学科的教育背景。

教育学科 22 位长江学者多数成长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时期教育学科分化层级不断向纵深发展，从一级学科间的交叉到二级学科间的衍生，分支学科逐渐增多，一些新兴的教育分支学科还处在初生之际，亟需先声之作、扛鼎之著、综合之论和特色之述。在这一背景下，涉猎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更容易打破学科间的屏障，使用多学科思维解决科研困境，引领和推动我国教育学科的发展。

（二）研究生阶段就读知名高校

教育学科 22 位长江学者中，大学就读学校为“985 工程”高校的仅有 4 位，占比 18.18%，“211 工程”高校的仅有 5 位，就读学校为国外高校的有 1 位，另有 2 位学者的第一学历为专科，1 位学者的第一学历为中专。硕士就读学校为“985 工程”高校的有 9 位，占比 40.91%，“211 工程”高校的有 6 位，就读学校为国外高校的有 4 位。博士就读学校为“985 工程”高校的有 14 位，占比 63.64%，且聚集在北京师范大学（5 位）、华东师范大学（4 位）、厦门大学（3 位）、浙江大学（1 位）和华中科技大学（1 位）这 5 所高校，就读学校为“211 工程”高校的有 5 位，其中 2 位学者在西南大学，2 位学者在东北师范大学，另 1 位学者在南京师范大学，就读学校为国外高校的有 3 位。可见，随着学历层次的递增，22 位长江学者就读“985 工程”高校的占比逐渐变大。博士阶段的 8 所国内高校中，有 2 所高校在 2017 年教育部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教育学科为 A+，2 所高校为 A，2 所高校为 A-，2 所高校为 B+。可见，博士阶段在国内就读的 19 位长江学者均聚集在知名高校的优势学科。

教育学科 22 位长江学者中，有 9 位学者硕士和博士就读于不同学校，其余 13 位（占比 59.10%）学者选择在硕士培养单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保证了学习的连贯性。

知名高校的优势学科中有强大的人力支持，优秀的学者聚集在这里，一起工作学习，他们愿意分享并帮助他人，思想的碰撞产生新的学术。

（三）博士阶段得到名师指导

从博士阶段的指导教师来看，19位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中，有2位学者的博士导师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始人潘懋元教授，有2位学者的博士导师为“霍英东教育基金”获得者张诗亚教授。其他学者博士阶段的导师也均为我国教育学科的顶尖知名学者，如何克抗教授、王承绪教授、王英杰教授、谢安邦教授、吴康宁教授、叶澜教授、金一鸣教授、薛天祥教授、吴式颖教授、杨国桢教授、黄济教授等。哈里特·朱克曼指出，科学界精英中有大量的社会性近亲相传现象，多是通过师与徒的纽带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是持久和重要的。美国学者劳拉·帕格里斯（Laura L. Paglis）等通过五年半的跟踪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入学时的能力和态度指标后，导师学术指导的效果与博士生随后的学术生产力和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

多位长江学者在学位论文“致谢”中提到，导师不仅以其深厚的专业知识指导自己怎样进行科学研究，怎样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且从论文选题、开题报告到论文撰写，导师都会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甚至对论文体系结构、内容观点的遣词造句亲自修改，在与导师长期的交流与讨论过程中，其人格修养、学术态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此外，多位特聘教授在接受自己导师指导的同时，也得到了上述其他老师的指导。例如，在博士学位论文“致谢”中，张斌贤（导师为吴式颖教授）提到王承绪教授、黄济教授等对论文的关心和指导；眭依凡（导师为薛天祥教授）提到潘懋元教授在其读博期间通过各种形式对其学业和论文给予的关心和指导等。

五、总结与建议

大量的事实和实例表明，教育学科22位长江学者的成长是由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两大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以下几点规律。

第一，将个人研究主题与国家重大教育问题联系起来更容易取得突破。教育学科22位长江学者将研究主题定位于国家教育领域亟需解决的但长期未得到解决的“痛点”，将自身价值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相结合，只有个人奋斗与国家需要一致时，个

人才在科学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因此，注重培养科研人员的爱国情怀，增强对国家的归属感，强化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创造出更高的科研绩效，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第二，研究生阶段就读知名高校的优势学科对人才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术研究领域的成才往往得益于学术氛围浓厚的场所。知名高校拥有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较早接触先进理念，进入科研的前沿领域。学科是高校学术地位、办学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更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和创新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如何系统谋划、完善机制，强化学科水平在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使研究生招生资源进一步向高水平学科聚集，是当前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培养单位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第三，博士阶段获得名师指导同样对人才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导师指导对博士生的学业成就至关重要，导师在博士生从学习者成长为独立研究者的过程中发挥一种引导性的作用。因此，要切实改变以往单独评定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做法，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取消研究生导师终身制。同时，要改变单一以科研为导向的导师评价机制，把对学生的学业指导、学术交流、思想政治教育等纳入导师评价。

第四，交叉学科教育背景有利于科学人才有宽厚的知识基础。大多数长江学者大学阶段的交叉学科教育背景为其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例如，有1位学者博士及以后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教育，其大学所学专业为英语；有1位学者博士及以后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技术，其大学所学专业为数学；还有1位学者博士及以后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科举制，其大学所学专业为历史。在当下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背景下，知识更容易在交叉学科的情境中生产出来。通过交叉学科的模式来培养博士生，恰恰也是近20年来全球博士生教育改革的大趋势。2013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多学

科交叉培养。

第五，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研究“真”问题。新知识生产模式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知识在应用的情境中被生产出来。教育学科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社会科学，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相互作用更利于教育学科学者的成才。教育学科 22 位长江学者在获得博士学位前普遍具有实际的工作经历，在学习中主动接受知识，具备一定的研究和反思能力，对教育现实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当前我国许多年轻学者系统学习西方教育史，留学国外，但对我国的教育现实问题未有深刻认识，只有立足我国教育国情，增加教育实践的机会，才更利于成才。因此，要进一步加强高校与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的战略合作，建设拔尖创新人才联合培养平台，完善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水平研究生培养的机制设计。

（原文刊于《中国高教研究》2018 年第 3 期）

本期视点

新型高校能否激活一池春水

一所刚刚获批设立的大学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可以让施一公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职务，担任全职校长？可以吸引年事已高的杨振宁先生担任校董会名誉主席？可以吸引诺贝尔奖获得者戴维·巴尔的摩等一大批教育与科技的领军人物鼎力加盟？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高等学校——西湖大学，16 日举办校董会第一次会议，吸引了各方的高度关注。

关注中蕴含期待。开展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回答着创新驱动发展这一时代考题；集合众多“千人计划”学者、打造集国际经验与中国特色于一身的高等学府，回应着“双一流”建设的教育课题；乘着民办教育东风、获得国家重点

支持，探索民办教育的发展路径……可以说，西湖大学的成立既顺应了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大势，也探索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多元路径，更契合着整个社会对创新的更高需求。

“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定位，彰显了这所学校的卓尔不群。与过去我国不少高校盲目追求“大而全”不同，西湖大学将避免走“跑马圈地”、盲目追求规模和数量扩张的老路，以博士研究生培养起步，聚焦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成果转化，从理学、工学和医学三门学科类做起。古人说，“致广大而尽精微”，先精先微，方可至广至大。坚持将优势与特色最大化，坚持内涵发展、注重质量提升，西湖大学的定位，为更好发挥高等教育人才与智力支撑作用奠定了基础。

“以制度为基础，按规则办事，给校长最大的治校空间，给教师最大的治学自由”，校董事会主席钱颖一如此寄语。与以往的高等教育改革不同，西湖大学的成立彰显出不同的改革路径，从民办高校切入，能够在借鉴公立高校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发挥新型大学机制灵活的优势，从而更好地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创新理念转化为教学与科研成果。探索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推动高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厘清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边界……西湖大学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将为解决多年来困扰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蹉路，为更多高校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天下事，唯有教育一事，与责任、温度、使命、情怀系得最紧、最密。西湖大学从筹备到建立的过程，倾注着党和政府对教育念兹在兹的关心，也展示着科学家群体报效祖国、立德树人的满腔热忱。西湖大学首任校长施一公在刚回国时就说“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在竞聘演讲时更是直言“人生为了一件大事而来，西湖大学就是我生命中的这件大事”。副校长许田教授辞去了耶鲁大学的终身教职，相信“这是一个可以一起奋斗和实现梦想的事情”。西湖大学从成立开始，就饱含家国情怀，承载复兴梦想，寄托殷殷期待，“有可能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之路上的一座灯塔”。期待西湖大学能够破解深层次难题，激活高等教育的一池春水。

西湖大学恰如一面镜子，映射出我国高等教育在新时代焕发的生机与活力，也映照我国高校向世界一流迈进的坚实脚步。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每一项改革举

措都行之不易，只有审慎推进，方能行稳致远。用施一公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今后的道路阻且长，但我们坚信，未来，我们终将不辱使命！

（《人民日报》2018年4月18日 作者：赵婀娜）

人才头上那顶“帽子”，留还是不留

在高校人才选用过程中，重名轻实的情况逐渐普遍，现在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甚至有影响学术生态、阻碍学术发展的危险。

“帽子”最初是顶好帽子

人才帽子产生的历史并不长。上世纪90年代以前，除教授、副教授、讲师等职称头衔外，只有学部委员（院士）名誉学术称号，其他名誉称号很少同薪酬待遇挂钩。

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为支持优秀青年科学家静心按照个人兴趣持续开展研究，设立了总理基金（即后来的杰出青年基金），的确吸引了很多优秀青年努力做好科学研究。彼时杰出青年基金只是科研项目，也没有与薪酬待遇挂钩。

为配合国家“211工程”计划，解决当时大学教授、科技人员薪酬偏低的问题，给优秀学者提高待遇，教育部在李嘉诚先生的支持下，设立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人才计划开始与薪酬待遇挂钩，应该说这给了优秀青年学者很大的激励。

后来高校、科研院所的经费状况逐步改善，内部开始实行绩效工资制度，开始把论文、项目、奖励等纳入绩效工资部分，加大优秀教师、科技人员的激励力度。

再后来，国家为了大力吸引优秀出国人员回国，出台了“千人计划”，产生了积极影响。

这种积极影响激发了各级政府、开发区和大学、科研院所，于是各级各类人才计划纷纷出台。据不完全统计，这种计划全国大约有200种之多。

“帽子”是如何被戴歪的

帽子开始泛滥，逐渐产生一系列问题，比如引进人员与已有人员的矛盾，国内学者与海归学者的矛盾等。这些计划绝大部分和薪酬待遇、科研经费等挂钩，甚至与住房、家属工作安排、行政级别待遇挂钩，新老人才激励政策的不同，也加深了一些矛盾。

科研人员对各级各类人才计划积极性非常高，有些人甚至把人生目标按照人才计划来定位，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打包组团、人情公关等在学术界开始此起彼伏，静下来潜心学术、攻坚克难、精益求精、实事求是等科学精神逐渐被淡忘。这些问题开始动摇学者的学术追求目标，影响科学研究的初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术研究的社会环境，破坏了中国的学术生态体系。

应该说，人才计划最初的意图和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后来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各类人才计划一是给帽子、二是给票子、三是给位子。这些东西是人隐晦的需求，大多数时候学者并不会把它们当作职业追求的主体目标。但是，一旦社会上把帽子、票子、位子作为对知识分子的激励，一些学者也就丢弃了日常谨慎行事的准则，将个人职业追求堂而皇之地与利益结合，甚至是不惜手段，逐渐把学术发展的目标、学术规则的底线忘记了，久而久之学术生态不复健康。

人才计划问题的异化看上去是帽子、票子、位子的问题，归根结底却是分配制度的问题。从薪酬制度的角度看，高校、科研院所的绩效薪酬制度既不适应高校，也不适应人才市场，而国家对机关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大一统的薪酬政策，高校、科研院所难以形成体现本行业特征和具有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薪酬制度，这就迫使着帽子不断演变为位子、票子的砝码。

怎样把“帽子”扶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实力不够，社会分配不太正常，“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握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通过科技奖励、人才计划等方式，让一部分优秀学者、科技人员先提高收入是无可厚非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学者、科技人员群体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尤其是当前人才帽子满天飞，一些人才计划及其

待遇的正面作用在变小，负面作用越来越凸显。各级政府和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应该对人才计划实施以来的正反面作用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仔细反思人才计划政策设计和实施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怎样才能彻底纠正人才计划的负面影响呢？人才计划问题的表现形式是帽子、票子和位子，但是其核心问题是收入分配制度，因此解决帽子问题必须从薪酬制度着手。

从政府层面，各级政府一方面要努力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鼓励学者、科技人员潜心学术、精益求精、创新攻坚，从政策法规上充分保证高校、科研院所的基本经费投入。政府要更多从宏观层面加强对大学、科研院所的指导，支持建立以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为主体，促进学校院所科学发展的人事薪酬制度，从法律层面严格规范学者、研究人员的收入渠道和方式。

政府要逐步压缩甚至完全取消各级各类人才计划称号和政府出资的奖金奖励方式，如果一定需要通过设立一些荣誉称号、科技奖励树立社会典型和学者、科技人员的标杆，一方面应该统筹设立，能不设的尽量不设，严格限制数量；另一方面，设立时要严格遵循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原则，不要关联高额奖金和相关待遇；在评审过程中，要按照严格的程序和办法产生相关的人选，杜绝人情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

从学校院所层面，大学、院所要努力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内部管理制度，努力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要加强学者、科技人员培养教育，树立潜心学术、淡化名利、严守学术规范、严格学术要求的职业观念。学校院所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设计符合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特征相适应的薪酬体系和有限强度的绩效奖励制度，坚持以职责任和履职评价确定薪酬，彻底淡化以帽子定薪酬，通过严格认真的履职管理和考核评价，保障学者、科研人员体面的收入水平，促使学者、科技人员潜心学术研究工作。学校院所也可以通过有限强度（较小）的绩效奖励方式提高学者、科研人员中优秀人员的收入水平，对于一些应用研究特别优秀的人员，可以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后市场收益激励的方式奖励他们的贡献。

（2018年5月4日《科技日报》，作者赵跃宇为广西大学校长）

邬大光：看得懂做不到的“剑桥之经”

剑桥大学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相当一部分国内大学的管理者都去过剑桥，在大多数人眼里，剑桥是世界大学的“活化石”，是世界大学的“珍品”。笔者也去过剑桥几次，每次都抱着“朝圣”的心态，但“真经”似乎并没有取回来。虽然在过去若干年，国内高校植入了一些剑桥的做法：如学院制、导师制等，但实践下来，往往给人“跑偏”的感觉，也使“剑桥之经”打了折扣。

日前，笔者参加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和英中发展中心共同举办的“2018年中英教育峰会”，为了找到点儿“真经”，事先做了些功课，重温了金耀基先生的《剑桥语丝》。如此为剑桥准备功课还是第一次。原本希望能够取到“真经”，可是两天下来，看到了真经，也看懂了真经，可要把这些真经移植到国内，且做到不打折扣，还真非易事。概括起来，有如下若干做不到：

真正的本科生导师制做不到。虽然国内高校也都在推行本科生导师制，但无法做到剑桥的31个学院那样：导师每周要与本科生见面两次，做到一对一或一对二辅导。国内高校没有这样的刚性要求，即使有这样的要求，恐怕也做不到。

生师比做不到。2016年度，剑桥在校学生总数18420人，其中本科生11934人，占64.8%；研究生6486人，占36.2%。剑桥大学教职工总数为11147人，其中教学科研人员（终身教职）1686人、合同制科研人员3950人，二者相加5636人。按此计算，剑桥大学的生师比大约是4：1。

教学科研人员与教学科研辅助人员比例做不到。如上所述，剑桥有教学科研人员（终身教职）1686人、合同制科研人员3950人，二者相加5636人。而教学科研辅助人员2017人、神职及文秘人员1840人，二者相加3857人。按此计算，教学科研人员与辅助人员的比例大约是1：1.5。

期末考试挂科就退学做不到。在考试挂科这个事儿上，我国大学已有补考、重修制度，但不知从何时何校开始，又“创造”了“清考”以及“毕业后大补”等“补救措施”。这两种“补救措施”不仅剑桥人听不懂，即使国内二十几年前毕业的大学生

恐怕也听不懂。

剑桥的两种创收方式做不到。一是进校园收门票做不到。剑桥沿康河而建的几个老学院都收门票，价格从5到12英镑不等，最贵的应该是国王学院，据说是因为里面新立了一块徐志摩《再别康桥》的石碑。二是每逢假期，学生要把宿舍腾出来做不到。剑桥要求学生，假期一律把宿舍腾出来，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审批。腾出来的宿舍做“创收”之用，主要是承接各种会议和举办各种夏、冬令营。一年下来，至少上亿英镑。

每学年只有24个教学周做不到。剑桥和牛津一样，每学年三个学期，每学期8周，共计24周，这应该是世界大学中最少的教学周数安排。可剑桥出了96个诺贝尔奖，牛津出了60个诺贝尔奖。我国高校每学年的教学周数一般在38—42周不等，不知教学周数的长短是否真的与诺贝尔奖相关？

大学的行政部门、图书馆、IT中心全身心为师生服务做不到。以剑桥大学图书馆为例，剑桥没有的书，只要世界上有，都尽可能帮你找到。再以IT中心为例，电脑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帮你解决，甚至可以帮你做几张动漫式的PPT。

博士学习阶段，只有两门课程做不到。此次访谈了四位博士生，他们在剑桥的第一、二年，即在成为博士生候选人之前，只有两门课程：一门理论专题课，一门方法论课，基本上是每个教授讲一、二讲，共同完成两门课程。凭个人经验判断：我国“双一流”大学的博士生课程门数，恐怕没有一个学校低于1000门，每一位博士生修的课程很少低于6门。

当了校长或院长，不做“学问”做不到。此次会议，与剑桥的两位院长有交流，分别是圣约翰学院和克莱尔学院的院长。他们说，当了院长就不能再做学问，必须全身心投入到管理工作中去，无论校长或院长，管理就是服务。对每个教授而言，在“从政”与“从学”之间都是一个痛苦选择。

大量的跨学科做不到。本科生课程的跨学科、研究生科研训练的跨学科、教学科研组织的跨学科、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住宿的跨学科等。在剑桥，可以说跨学科无处不在。

写了这么多做不到，决不是在贬低我们自己。是否非要做到？也不一定吧。可能是因为剑桥已有 809 年历史，我国近代大学只有百余年历史，历史积淀得不够，才导致了这些做不到。

笔者想，在上述做不到的情况下，我们的大学如何理解剑桥之经，如何借鉴剑桥等世界名校经验建设中国的一流大学，才是最为关键的。（作者系厦门大学副校长）

（《中国教育报》2018 年 4 月 23 日 作者：邬大光）

大学课程

大学课堂该如何消灭“水课”

上课铃早已响过，北京某高校某教室里已经趴倒了一大片，只有少数坐在前排的同学依旧“坚挺”。新学期，记者探访部分高校课堂，发现与选课时热火朝天的景象相比，不少学生“费尽心力”才抢来的通识课堂上，却是一片死气沉沉。

选而不修的尴尬从何而来？本由学生自主选择、旨在激发其个性志趣的通识课堂，怎就和“水课”画上了等号？挤去这本不该存在的水分，又该从何下手？

选而不修的尴尬

按照培养计划，大学四年里，天津某高校学生张欣然完成 147 个学分才能毕业。这其中，除了校院两级的公共必修课程 73 个学分、专业必修课程 33 个学分外，她还需要完成 26 个学分的专业选修课程和 15 个学分的任选课程。

“几乎每所大学都会流传一本‘水课大全’，我这 41 个学分的选课关键就是看好不好过、给分高不高、老师点不点名。”张欣然告诉记者，每到选课季，符合上述要求的课程总会被同学们一抢而空，而对于那种“要求多、给分严格”的课，大家都是“有多远躲多远”。

“‘科学通史’平时不点名，考试划重点，分数还好；‘体育欣赏’节节点名，上课看电影，期末交论文……”记者登录一些高校论坛发现，这些在学生间流传、更新的“水课大全”对上课内容、给分情况等都有细致详尽的描述，有的甚至长达几十页。

“有些课光听名字就没什么兴趣了。平时的课业压力已经很大了，选修课能轻松过关就好。”张欣然坦言，自己没有翘课，已经算是勤奋的了，“‘必修课选逃，选修课必逃’早就是传统。”

选而不修，有的学生是因为根本没把选修的通识课当回事，还有不少同学是因为没能从课上学到自己原本想学的知识。

这学期，北京某校的大二学生张林选修了一门“生活中的地理学”课程，可没上几次，就打起了退堂鼓：“我是学英语专业的，本身就是零基础，原以为这门课程会根据选课学生的基础进行适当调整。可上起课来却觉得老师好像还在上专业课，讲述内容也多是气象、地质灾害等专业内容，感觉和现实生活离得有点远。”

在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看来，这些“水课”正是中国大学与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所在：“在大学里面，所谓‘水课’通常出现在非专业课里，一般来说，专业课是相对有保证的。绝大多数的专业课，即使还没有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但至少消灭‘水课’是可能的。我们和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非专业课，亦即所谓的通识教育的课程上。”

通识课缘何变“水课”

在新雅书院 2016 级学生开学典礼上，甘阳表示，书院过去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消灭水课。

事实上，随着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变革，通识教育成为热点问题。早在 2015 年 11 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就成立了“大学通识教育联盟”。近年来，与新雅书院类似，复旦学院、浙大求是学院等也相继成为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的试验田。

一面是在通识教育领域不断发力的中国大学，一面却是对教学内容不买账的学生。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很多同学信奉‘GPA（平均学分绩点）至上’。不少人认为奖学金、保研、留学等远比一节课带给大家的知识更重要。我绝对不能容忍自己得低分。如果这门课好，但给分严格，我会旁听，但不会去选。”张欣然告诉记者，“功利性选课”是影响大学生宁选“水课”不选“硬课”的重要原因。

“部分教师对待选修课的态度不认真，因人设课、从简开课，很多老师的教学内容不能及时更新，甚至和现实脱节，导致学生不愿意学。”从事教务工作十余年，长春某高校教师郑丽对这种现象颇为无奈，“还有的教师为吸引学生选课，给分随意。这种没有标准的考核也对学生产生了误导。”

此外，也有教师告诉记者，目前高校对选修课程的论证、评价机制过于简单，“现在开什么选修课，往往由任课教师或开课院系决定，缺乏针对学生群体的严谨调查与论证；而在课程评价方面，也主要采用学生评教，那些要求严格、难度较大的课程往往会被学生抛弃，形成恶性循环。”

甘阳认为，这是因为教与学的基本心态出了问题。“在长期的唯专业主义的影响下，学生会认为‘这反正不是专业课’，他首先就不重视。老师也会认为‘反正你不是我自己专业的学生，你爱上不上，随便’。最重要的是，在这些非专业课上，老师一般不敢对学生提出严格的学术要求。所谓‘水课’其实就是没有学术要求的课。而美国大学所谓的通识课和专业课，他们的要求是一样的，都需要你付出极大的努力。”

建立评价退出机制，为课程“脱水”

“能激发兴趣、培养品位的才是好的教育。如果不能激发兴趣，说明这种所谓的教育只是展示知识、演示技能，没有触动学生的心智结构。”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认为，必须要在如何开课、开哪些课上下功夫。陆一表示：“如果越上学生越感觉到有深意，逐渐触碰到了自己原先没有打开过的新世界，攀登上了原先没有站立过的新高度来看问题，兴趣和意义感便油然而生。不在激发兴趣的实质上下功夫，却标榜给学生很大的选择自由，其实是在逃避教育责任。”

“应该砍掉现有的一部分课程，不能‘把通识教育当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张亚群说，“对于今天的中国大学来说，必须精选通识课程、改善课程内容，课程质量提高了、对学生真正有帮助了，吸引力自然也就上来了。”

除开课环节要严格把关、精心设计外，采访中，不少专家建议，还要建立课程监督、评价和退出机制。

此前，复旦大学表示，将在新学期进行新一轮课程改革，集中清理一批不符合人才培养需求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其中包括一些因人设课或是质量不达标的课程；对于新开高质量课程的教师，还将予以最高可能达数十万元的重奖。据了解，这也是国内高校首次集中清理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不符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李奇表示：“一是要有必要的激励机制，鼓励教师精心开课，尊重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同时也要符合学生的需求，而不是为了满足工作量而上课，或者为了满足学分要求而选课；二是要有科学的评价机制，改变标准化生产和管理的方式，使教学成为探索、发现、思想碰撞和分享的过程，而不只是一个搬运过程和监督搬运的过程。”

还有专家告诉记者，目前也有部分高校在教师评分体系上制定出更加详细的标准，杜绝教师给分手松的行为，对打分不符合标准的老师进行提醒，并且还课程作业、试卷进行留档，定期抽查是否符合评判标准：“鼓励同学们通过努力学习，而不是投机取巧获得好成绩，增加了给分的公平感。”

陆一认为，消灭“水课”，实证调查与科学评估同样必不可少：“在复旦大学，我们通过与大学核心课程委员会、模块负责人、教师 and 不同专业的学生、毕业生等各个层面的深入讨论，研制了‘高能课：中国大学通识课程教学质量测量·诊断·评估·改进’工具。该调查工具设计了十一项核心可比指标和五项可选高阶指标，能够多角度刻画出每门课程、各模块及总体通识课程的教学质量。在调查数据的使用方面，基于指标数据生成‘吹水指数’和‘刻苦指数’，提倡教学质量要由师生共同负责，直观地筛查出几种高效能课程和‘水课’等低效能课程，并一一对应给出教学支持与管理建议。”

（《光明日报》2018年4月10日 作者：邓晖 张雅凌）

上线课程达5000门，超7000万人次选学，课程量、学习人数均居世界前列

慕课助中国高等教育“变轨超车”

只需一根网线，就能连通高等教育殿堂的梦想之路——慕课这一互联网、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结合的产物，正最大限度共享优质课程资源，打破传统教育时空界限和学校围墙，颠覆传统大学课堂教学方式。

近年来，中国特色慕课建设与应用，为破解校际教学质量差距大、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提供了有效方案，推进了教育公平，促进了教育质量提升，已经成为新时代加速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引擎，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变轨超车”的关键一招。

让优质教育资源效率倍增

高校学生想选修多位著名将军讲授的“军事理论”课，并与航天英雄杨利伟在直播课堂互动？想与守望敦煌50年的专家樊锦诗共话敦煌艺术？社会学习者想加入“网红”课程、浙江大学翁恺的“C语言系列课程”学习？没有地域限制、没有校际差别，慕课上的优质教育资源能让大家共享。

目前，我国上线慕课数量达到5000门，高校学生和社会学习者选学人数突破7000万人次，超过1100万人次大学生获得慕课学分，中国高校慕课总量、参与开课学校数量、学习人数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慕课大国。

校际教学质量差距大、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突出问题。而慕课的建设与应用，恰恰为这一问题的破解提供了解决路径，推动了东中西部高校优质课程资源共享，形成了新型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方式。

今年年初，教育部推出首批49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涵盖文、理、工、农、医等所有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立刻成为广大学子最新鲜、优质的“精神食粮”。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仅以东中西部高校共享优质课程资源为例，2017年西部高校选用慕课达到8600门次，慕课“走进”西藏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青海大学、宁夏大学等西部高校和基础薄弱高校，使之成为最大受益者。

让终身学习不再是奢望

安老先生是成都市一名中医爱好者。上世纪70年代，他自学针灸并在猫身上练习取穴，却发生了致猫死亡的“医疗事故”。2017年3月，已年近85岁的安老先生发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针灸学导论”慕课课程。从此，他终于有机会正规学习针灸知识。

人人可学、处处可学、时时可学——我国慕课类型和学习方式多样，有满足高校在校生学习的学分课，有适合社会学习者职业需求的专业课，也有提升大学生和社会大众科学、文化素质的通识课；既有大量面向国内受众的课程，也有在国际著名课程平台上线的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中国高水平大学影响力的课程；既可以自主选择部分内容学习，也可以全课程学习并获得证书……

因为具有高质量、低成本、开放性等特点，慕课已经成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优质学习资源，并在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国家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了解，目前，除了高校和社会学习者外，党政干部管理系统、教育系统、军队官兵职业培训系统以及各行各业纷纷向课程平台定制慕课课程，中国高校慕课应用正在向更广阔领域拓展。

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5年来，我国慕课建设与应用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德学兼修，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寓于教育教学全过程，促进专业教育与思想道德教育的紧密结合，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平台，发挥了传播正确思想、弘扬正能量的功能。

慕课突出以学生为中心设计课程内容和方式，增强了对学生的吸引力，师生互动答疑解惑、教学相长，从“教得好”向“学得好”的转变正在悄然发生。高校思政课堂变得“有虚有实、有棱有角、有情有义、有滋有味”，成为“有温度”“高颜值”，学生想学、爱学的课程。

2017年“最美教师”获得者、主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的清华大学副教授冯务中曾这样总结慕课给传统教学带来的新活力：智慧教学工具调动学生手机互动、答题，提高抬头率，解决“入耳”问题；同学们针对某一重要问题展开交流甚至辩论，给了学生自由思考的空间，提高互动性，解决“入脑入心”问题。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国希联合北大、人大、上海交大等学校优秀思政课教师，不断优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不仅带“火”了一批深受学生喜爱的优秀青年教师，还与课程应用高校形成一个大范围的“共享协作式课程共同体”，将总体上的“漫灌”和因人而异的“滴灌”结合起来。课程运行8个学期以来，累计选课校次达185所，累计选修学生达28万人。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据了解，下一步教育部将加大力度推进名师积极建、教师积极用、学生积极学，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慕课建设与应用向纵深发展，为世界慕课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中国教育报》2018年4月17日 作者：胡浩）

发送范围：校领导、学校中层领导干部

淮阴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中心联系方式：

网 址：<http://www.ghc.edu.cn>

办公地点：办公楼 6 号楼 101 室、102 室、103 室

联系电话：刘爱东 83525969 葛 军 83525596

皮 武 83525568 潘 浩 83525569

（校内准印号： HZ—016）